



中国的成年人，怕没有没看过春晚的。说起春节晚会这个话题，作为对比，有的人还会提起1956年的那个《春节大联欢》，且尊之为新中国的第一场春晚。我是在疫情期间，在电脑上闲翻，才看到这个旧视频的。看了之后，才知道孙谦先生当年有多火。

联欢会开始后，主持人郭振清说，今晚光临的嘉宾有劳动模范、战斗英雄、著名作家。真要具体介绍了，先说的是著名作家，共六位，原话是：每天上午坚持写作三个小时的老舍先生，老作家巴金先生，《暴风骤雨》的作者周立波同志，《保卫延安》的作者杜鹏程同志，电影编剧孙谦同志，《万水千山》的作者陈其通同志。

这是他手指嘴说的人名，实际的位置颇有讲究。

会场上大概有十几张圆桌，他左侧的圆桌上坐的是著名作家，正对着镜头的有三位，巴金居中，一边（巴金右）是老舍，一边（巴金左）是孙谦。巴金身后并排站着的是周立波和杜鹏程，圆桌这边，只能看到背身的是陈其通。也就是说，老舍、巴金和孙谦，坐的是主桌的正位，另外三位，或站立背后或坐在侧位。还有一个区别，有人可能没注意到，就是，正位上的三位作家都只说职称，不说作品，另外三位分别说了代表性作品。

或许有人会说，孙谦年龄大吧，不是的，周立波1908年生，陈其通1916年生，杜鹏程1921年生，孙谦1920年生，只比杜鹏程大一岁。

我知道我的这位师长级的老同事，是文艺二级，在省作协院里薪金是最高的，解放初期颇有声名，却没想到，会显赫到如此地步。

在山西，我们都是把他当小说作家看的，怎么这里会说他是电影编剧呢？

这就要说到他早年的经历与业绩。抗战胜利后的解放战争，最早是在东北打响的，长春攻下后，派去接收电影制片厂的人员中，有进步的电影从业者，也有解放区来的文化工作者。孙谦就是后一种人中的一员，他是晋绥边区派到东北去的。原先写小说，到了电影制片厂，就顺理成章地写了剧本，上映的有《葡萄熟了的时候》等多部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文化部创办北京电影制片厂，又调他到了北影，也写了好几部电影。有此经历与业绩，也就有了电影编剧的头衔。

实际上，他一直是小说作家，比如他最有名的电影《伤疤的故事》，就是先写成小说，后拍成电影的。

一个小说作家，在这样隆重的聚会上，竟与巴金、老舍一起坐在主桌的正位上。在我看来，不是凭了他电影编剧的身份，还是凭了他小说的巨大影响。为了写一篇文章，我从网上购了孙老师早年的几本小说，看看这些小说的出版与发行，就知道他当年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声望了。

共三种，分别是《夏天的故事》《奇异的离婚故事》和《伤疤的故事》。

《夏天的故事》，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北京第1版，1955年北京第1次印刷，85000册；《奇异的离婚故事》，长江文艺出版社1956年5月第1版，1957年1月第3次印刷，83000册；《伤疤的故事》，山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4月第1版，1959年8月第2次印刷，23005册。

再看字数，《夏天的故事》8.5万字，算个中篇小说；《奇异的离婚故事》，2.7万字，也算个中篇小说；《伤疤的故事》，11万字，是个集子，收小说散文共11篇。

孙谦的小说，著名的有三篇，都在这个集子里，分别是《奇异的离婚故事》《有这样一个女人》和《伤疤的故事》。最著名的，该是《伤疤的故事》这个两万字的短篇小说。发表后很快拍成电影，全国放映，改革开放后，太原还放映过。我就是那时看的。有这样的小说和电影，可以说，当年的老作家里，论当时（注意，是说当时）作品的影响，还要数他最大。

## 古城回声

## 补面袋和麻袋

梁建军

布面袋对现代人来说是比较陌生的，但在30多年前，面袋是家家户户离不开的买面装具。那时的面袋由白布制作，重复使用，面袋挂破磨损开线，就要织补，补好继续使用。

大面粉厂都有器材科，有几十号人专门缝补面袋和麻袋。父亲所在的粮库有个面粉车间，由于产量不大，面袋和麻袋由家属或临时工缝补。那时的家属大多都是从农村来的，没有正式工作，家属们补面袋也能挣钱补贴家用。缝补面袋、麻袋按条数计件付酬，对时间场所也没有要求，大家都把面袋、麻袋拉回家里补。父亲一次要拉满满一平车面袋，有近千条，妈妈补好后，送回去再拉破面袋。

补面袋是非常辛苦的，妈妈每天吃了早饭就开始缝补面袋，吃了中午饭，顾不上午休。妈妈出手慢，光怕落在别人后面，晚上熬夜补到十一二点才休息。一天能补七八十条，补一条挣2分钱，一个月下来能收入四五十元。

补面袋还有两个福利，一个就是赚补丁。补丁是包干的，补100条面袋，发101条，其中一条做补丁，节约归己。补丁面袋要挑最破的，破口小的面袋既好补还会省补丁布。由于补丁是“量体裁衣”“才尽其用”，妈妈补面袋补得多了，就节省了不少补丁面袋。那些面袋拆开洗干净，可以用来

做被里子、鞋里子、衣服里面的衬布，还能省些布票。

再一个福利就是能抖些土面。面袋拉回来，在缝补以前，爸爸要把面袋抖一遍。把一个瓷碗放入面袋底下，碗口朝上，抓住面袋两边，上下抖，把面袋上粘的面抖落到碗中。通过抖面，把附在面袋表面的面和土抖干净，补面袋时面袋上的土就少了。更重要的是把面袋里的面抖落收集起来，面里含碜量不大的，就能蒸馒头吃了，虽然有些牙碜，但比窝头好吃多了。含碜量太大，或是红面袋子里抖出来的，就留下喂鸡或做浆糊，做鞋面袼褙子用。

天气暖和时，补面袋一般就在家的后院里。天气一冷，就只能在家里缝补，柜子上一会儿就是一层土。院里十来户都在做补面袋的工作，孩子们也都是十来岁，我们就比赛减轻妈妈们的负担，看谁会做家务。那时，我们放学后就学着熬稀饭、洗锅，打扫家，有时孩子们还会相互参观或炫耀一下，看谁把家打扫得干净。我做家务就是从那时开始的，也算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吧。

1998年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卫生意识的增强，太原市开始推广一次性编织袋装面，重复使用的布面袋就退出了市场，补面袋的工作也就消失了。

岁月留痕

## 远去的风筝

晓根



一日，我正在小区走路锻炼，忽见小区南面的天空上飘着一只别样的风筝。之所以说它别样，是因为在众多的风筝里，这是一只现在很难见到、手工制作的、最简单的老式风筝。它只有一个方形的脑袋和两条长长的尾巴，与那些花花绿绿、有着各种造型的风筝相比，虽显得简陋、土气，但却给人一种久远了的亲切感，一时间脑海里思绪翻飞，竟勾起了我对儿时放风筝的无限回忆。

在我的童年时代，每年春天都是要和小伙伴们去放风筝的。当“草长莺飞二月天，拂堤杨柳醉春烟”的春天到来的时候，放风筝就成了我们最主要的游戏之一，每天放学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跑到村外广阔的田野里去放风筝了。

童年的故乡，天高、风清、云淡。于是在村口麦子刚刚返青的田野里、在拾掇粮食的场儿里，满天的燕雀与风筝，似在竞相比高。一只只风筝像是开在空中一朵朵漂亮的花儿，更像是泼墨在空中形成的一幅幅斑斓色彩的图画，令人赏心悦目，驻足凝望。那种天上满天风筝、地下满地孩童的景象，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而每一次风筝的放飞，身后总是有几个小伙伴欢呼雀跃地跟随着奔跑，那

份快乐的心情简直比过年放炮还高兴。特别是放飞的时候，眺望摇曳在万里晴空的风筝，那份专注、欣慰、恬静，使人荣辱皆忘，杂念俱无，那是一种对自己心情的尽情释放，是把心情像风筝一样放飞到高阔天空去自由飞翔的怡然和感动。

当然，也有懊悔的时候。一次，由于风向突变，我那刚刚升空的风筝一下子被挂在了高高的树梢之上，我手里攥着崩断的棉线，望着无望而得的风筝，无助地放声大哭起来。直至今日，每当看到空中飞翔的风筝，我仍会想起那只挂在树梢上的风筝……

作家席慕容说过：“走得最急的总是最美的时光。”美好的童年对于一个人的生命而言只是刹那的璀璨，仿佛嘴里的那颗糖果还没有含化，就忽然长大了。长大的日子里我常常独坐一隅，怀念远去的生命之初，还有童年时代那份纯真和无忧无虑。尤其是在参加工作以后几十年里，那个在旷野里拽着风筝奔跑的顽童还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。